



1995-12-15

讀者參考

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夫人

美国科技为何能坐头把交椅?

昔日证券英雄管金生自述

举世齐颂《平安夜》

一个新闻热点的来龙去脉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潘虹独语

不要为智商所累

重提贝利亚

学林出版社

READER'S
REFERENCE DIGEST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我们应有的反思

天下事

- 10 国际刑警在中国
16 历史的回声：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
20 日本已成军事大国

社会广角

- 21 一个新闻热点的来龙去脉
26 用公款私人经营愈演愈烈
27 医药“回扣风”追踪录
31 上海戒毒所的采访实录

世态风情

- 35 两个大都市
37 “京味儿”内外
39 深圳历险记

人 物

- 42 两个“文化民工”在北京
49 管金生的自述
——曾经是证券英雄，现在
只求做枕木
53 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夫人
59 重提贝利亚
66 中国唯一的院士市长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

婚恋与家庭

- 67 孙犁与梅的恋情
70 潘虹独语：缘断情未了
73 新风霞：我爱我的家
74 密特朗与五十五束红玫瑰

文化广场

- 75 青年知识分子：补补文化
修养课
76 大陆流行乐如何走出困境
79 “平民作家”梁晓声指责贵
族倾向
80 文物回流是喜是忧
81 毕加索自我解剖：后期作
品乃哗众取宠

作家与作品

- 82 巴金与《再思录》
83 流沙河之为文
84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

改革与国情

- 89 我国改革今年取得四大进
展
89 财政收入下滑，资金流失
严重
90 我国进入温饱阶段后期
90 全国贫困县尚近六百：云
南最多，陕黔次之

- 91 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下降
91 建筑业将成为中国支柱产业
92 中国三百年内不愁油
92 工资货币化,福利工资化
92 逐步推行工资谈判制度
93 高新技术“下海”可获贷款
93 我国首次评估私营企业
93 个人所得税制拟进一步改革
94 中国劳动力素质潜藏危机
94 把国企改成国家投资企业
94 国企分配制度改革新思路
95 “模糊分配”做法应取消
95 我国利率将走向市场
95 扶持私有经济,但不搞私有化

科学与生活

- 96 世纪之交的十大科技
98 席卷全球的绿色革命新潮
101 我国今后五年科研重大项目
102 多媒体电脑走向家庭
103 美国科技为何能坐头把交椅?
104 地球生命是否来自宇宙?

教育园地

- 105 不要为智商所累
107 异乎寻常的早期教育与

天才坎坷的人生

- 109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教育观
110 各国高考不一样

体育天地

- 111 现代竞技运动中的“英才教育”
114 经纪人:体育事业的催化剂
115 运动可能是坏事
116 百年奥运发展的见证:
奥林匹克之都——洛桑

港澳台之窗

- 118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走向
120 香港的公务员制度
121 台湾风行“红包文化”
122 香港人升学“往北看”
123 台湾吹怪风,裸体写真成潮流

国外见闻

- 125 华人文化在美国
128 欧洲时兴四天工作制
129 咖啡桌上的欧洲历史
131 生活在传统与进步之间
——韩国纪行
134 新加坡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136 海外不奇谈

140 莫斯科人：穷，但不能没有鲜花

142 美国妇女的生育女经

新书架

119 大型摄影画册《神游三峡》

九州方圆

145 浦东辟出后代开发区

145 武汉成为内地最大商业中心

145 花8000万元建“小亭子”值吗？

52 广东人送子去贫困地区上大学

146 羊城六快

146 南京出现“伴读者”

146 山城新潮礼仪：送保险

147 我国首座空中体育场建成

147 中国十大富裕村

147 人造景点要治理

148 神州各地“三宝歌”

百科知识

149 举世齐颂《平安夜》

152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溯源

152 交响音乐的四个乐章

153 世界艺术名城

154 联合国简介

154 三个联合国城

154 百科全书的新与旧

155 蓝天到底有多高？

155 最大的地下淡水之海

156 古今计时对比

156 怎样减轻旅途疲劳？

157 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

157 五谷杂粮皆是“药”

158 吃水果也有讲究

159 儿时少看病有利身心健康

159 乘机人的权利

159 打官司要花多少钱？

补白

15 文化场中十八怪

20 如此缉毒太荒唐

34 交通部长细算“买路钱”

38 香港人的约会

48 于光远说：我是“二表人材”

66 我国失业率逼近警戒线

69 我国主要地方戏曲的分布

78 家庭格言

120 笑林：学问难成

封面 婉转于丛山峻岭中的大江

(选自四川美术版《神游三峡》)

《读者参考》丛书(6)

1995年12月15日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执行主编：林雨

责任编辑：金辉 桑木

封面设计：仁坚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1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邮政编码：200020

印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印张：5

字数：18万

ISBN7-80616-091-4/Z·7

定价：3.50元

我们应有的反思

葛剑雄

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了，人们正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节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总结和认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当时、今天和未来，对中国、日本和世界的意义。日本政府对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日关系，中国的统一，亚洲的新格局，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做的还是要反思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和战争前后的作用，考虑中国自己如何吸取这场战争的教训，如何自强，如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战后中国的态度与 政策值得检讨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对这场侵略战争作过深刻的反省。这有日本内部的原因，也有战后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对日本管制不力、对军国主义势力铲除不净甚至变相扶植等方面的外部原因，但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者的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值得检讨的。

照理，中国既是五大国之一，又是战胜国的主要一方，更是日本

的近邻，在对日管制、追究战争责任、审判战争罪犯、索取赔款、保证战后和平等方面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发挥主要作用，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而且连起码的要求都放弃了。这固然与中国的实力其实远远够不上“大国”，因而在不少方面起不了作用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蒋介石当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长期处于西方阵营的敌视、封锁和包围之中，海峡两岸剑拔弩张，对日本的关系受到这一形势严重制约。

东京审判草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形同虚设，日本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被宣判无罪，连同其他 260 名战犯一起匆匆遣返回国。当时毛泽东曾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命令国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茨，重新处置，并将这一条件列入国共谈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内。但在 1949 年以后，对被中共方面扣押的战犯的审判也是宽大无边，事先确定的方针就是一个不杀，重罪轻判，不久就全部释放。蒋介石对日本战犯当作对日关系的第

码，毛泽东也利用他们作为打破国际封锁、推动中日关系、显示中国人宽宏大量的手段。双方或许都获得了眼前的好处，也的确有一些得到宽大的日本战犯受到感化，但却都留下了长期的恶果。既然中国政府承认他们无罪或只有几年徒刑的轻罪，他们就不会深刻反省侵略罪行；既然连冈村宁茨这样罪大恶极的元凶都被宣告无罪，地位在他之下的战犯就更有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了；既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侵略罪行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没有作出全面、详尽、具体的揭露和审判，迫使日本正视自己的罪行，又怎么能指望在事过50年后日本政府和犯有战争罪行的人能自觉认识呢？退一步说，即使因为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要对战犯中某些人实行宽大，也应该首先彻底调查他们的罪行，按法律量刑，然后再加以特赦，岂能将他们的侵略罪行一笔勾销或任意缩小？

战后赔款的问题 并没有真正解决

轻易放弃战争赔款是中国对日政策的重大失误，既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无助于促使日本认识其战争罪责。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都已经向日本索取赔款，或保留了这样的权力，为什么受损失最惨重的中国就要放弃呢？日本应该赔偿，即使赔上了多少个亿，也绝对补偿不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

损失。其次，日本并不是赔不起。如果说在战争刚结束时，为了顾及日本人民的生存，暂缓一下索赔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那么，到了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理由了。

有人认为，赔偿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而战争的罪责不应由人民来负。这话貌似公允有理，实际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和人民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进行侵略战争，主要责任固然应由统治者负，但国民拥护他们、顺从他们，至少是容忍他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当年日本究竟有多少人反战？多少人为结束这场战争作过斗争？又有多少人卷入了战争？作为一个国家和国民反省战争责任的具体行动，承担一点赔款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而且，赔款的数量对日本来说是完全能够承受的，根本不会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德国在战后对赔偿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它至今还在为受害的犹太人作出赔偿。正因为如此，德国人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而德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并没有因为赔款而放慢。

还必须指出：中国与日本间的战争赔款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年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放弃赔款，是出于一党一人的私利。当时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人民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蒋介石的决定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人民。1972年中日建交时，

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形式都没有恢复，这样重大的决策实际上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即使是当时政府的决定，以后的政府通过合法手续加以改变也是完全正常的，国际上通过重新谈判改变以往的政府协定或条约都不乏先例。从道义上说，日本政府更应该主动寻求妥善解决战争赔款的办法。至于中国的个人或团体向日本政府索取应得的赔偿，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政府是一定会全力支持的，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政府和人民也是一定会同情和支持的。

必须揭露侵略罪行

正确对待历史的前提是正视历史事实，因此必须彻底揭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划清侵略和被侵略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和人民正视历史，才能迫使少数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人认罪。但有人片面理解中日友好，担心多讲侵略罪行会刺激日本人民，损害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样的担心毫无理由，因为已经认识了军国主义本质的人不会受到什么刺激，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年青人能受到教育，而对至今仍然持错误立场的人刺激一下又有何不可？对日本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来说，如果连这点“刺激”也受不了，又怎么会认识战争罪行，承担侵略罪责呢？

为什么德国的领导人能多次访问当年的集中营和受害犹太人的墓地，主动接受“刺激”，日本领导人的神经就那么脆弱呢？美国和英国之间、欧洲一些国家之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相互间从不讳言历史上的争端和战争，更不容许混淆是非。如果为了所谓友好而不敢谈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那两国之间连平等都谈不上，还能有什么友好关系？也有的人怕影响日本的投资和贸易，这更不成理由，投资不是无偿援助，贸易也是双方互利的，中国固然需要日本的投资，日本也需要中国这个市场。何况在商言商，做生意考虑的是经济利益，有钱赚的事影响不了，赚不了钱的事也求不成，与我们讲历史真相又有多大关系？

我们应该宣传即使在战争期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没有中断，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明，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毕竟只是少数人。大量存在的是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也应同情战争期间日本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但同时要立场鲜明地指出，其根源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身。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孤儿的同情只能以谴责战争罪行为前提，只能以同情中国数千万战争受害者和孤儿为前提。出于外交礼节对日本天皇的尊重，是建立在他正视历史、承认日本侵略责任的基础上的，丝毫不应影响对以往天皇所犯战争罪行的揭露和清算。出于

统一战线的需要和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对一些曾经或多或少效力于日本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宽大为怀，不究既往，不等于就能抹煞历史，颠倒是非，更不能容许美化汉奸，某些文艺影视作品、回忆录、传记歪曲历史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总之，我们自己如果不坚持历史事实，就等于放弃了向日本讨回公道的权利。

必须正视的历史，必须面对的现实与应该思考的未来

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是中国人民以数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难以计数的财产损失换来的成果，是全民族在反抗侵略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不屈不挠奋斗的结果。不过，要是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没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尽管最后的胜利必然会属于中国，但战争的进程会更艰难，战争的时间会更漫长，中国人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惨重。

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讳言这样的历史：

当日本侵略军炮轰北大营时，关东军对东北军并不拥有整体上的优势；当他们在卢沟桥发动进攻，在上海挑起战火时，中国并不是没有备战的时间和力量，尽管中国有过平型关、台儿庄、昆仑关的辉煌胜利，但往往比侵略者付出了高得多的代价；虽然中国保住了大后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但大多数失地

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才收复的。在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同时，一认贼作父的，充当汉奸走狗的，“曲线救国”的，“吃摩擦饭”的，以外敌作筹码的，发国难财的，苟且偷生的，战后为自己洗刷的，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的，虽然总是极少数，但人数并不少。相比之下，日本人中为中国和盟国效力的，公开或秘密反战的，消极对待或逃避战争的，比率要低得多。

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作为当年战败国的日本，早已在废墟中崛起，经济实力不仅已执亚洲牛耳，而且已跻身世界前列，并成为“西方七国”不可或缺的成员，作为民族象征的天皇依然存在，日本式的民主政体趋于成熟，除了北方四岛外保持了领土的完整，还要染指历来属于中国的钓鱼列岛。凭借强大经济后盾，在联合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并能问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对付阪神地震这样不可抗拒的天灾时，日本人所显示的不仅是富厚的物质基础，而且是惊人的精神力量。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权，却常常只能用之于投弃权票；人均国民产值不仅远低于日本，而且还有数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以至只能将“世界第三”视为洋人设计的荆棘桂冠。在“以德报怨”地放弃了数百上千亿的赔款之后，不得不为数亿元的贷款看日本的白眼，为一笔小小

的援助大唱“中日友谊”的赞歌，对一批并没有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吸取历史教训的日本政要一厢情愿地“向前看”。

我们更要想想未来：

再过 50 年，当我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00 周年时，中国人能不能与日本人过同样水准的生活？中国与日本能不能真正和睦相处？中国能不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政治上与日本平起平坐？

100 年前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在 50 年前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胜得勉强，胜得惨痛。50 年前开始的竞争今天还在进行，但日本明显占了上风。50 年以后，中国能不能打赢另一场“战争”？

看看日本人，再想想我们自己

一些国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往往非常全面，古今中外，天时地利一概不漏：封建统治的影响，反动政权的腐败，一穷二白的基础，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地理环境的不利，自然资源的匮乏，天灾的频繁，庞大而素质不高的人口，等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中国已往的落后事出有因，今天的落后情有可原，将来的落后在所难免。

但是在日本的事实面前，这一切论据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且不必说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如何强盛，日本人又曾经如何唯中国马首是瞻，就说实行明治维新的日本，至多只能说与中国在同一起跑

线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日本未尝没有历史的包袱，同样受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的门户也是被外国的军舰打开的，也曾与外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并让外国人享受过治外法权。当时日本国小民穷，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不比中国的高，毫无工业基础，经济实力更无法与中国相比，可以算得上“一穷二白”。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海军的装备和吨位还优于日本舰队。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蕞尔小国”不久竟会成为自己的劲敌。要不是它的迅速崛起，和亚洲的其他小国一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是完全可能的结果。

所以如果可以把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话，对日本的失败就只能承认是腐败的结果。要是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稍能振作的话，甲午战争的结果未必就是大败；要是北洋政府不是忙于镇压革命和内部争权夺利的话，对日本的交涉肯定不至于如此丧权辱国；要是蒋介石不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话，东北三省绝不会马上沦陷；要是国共两党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真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话，用于抗日的兵力必定更强，失地也不会如此之多，如此之快；要是各级政府和官员能够廉洁奉公的话，战争的间接损失和伤亡会大大减少；要是国共合作能够延续到战后的话，中国在对日管制和

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会真正起到大国的作用，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也不至于轻易放弃。同样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曾经实行过绥靖政策的英国，通过由丘吉尔取代张伯伦而转入坚决的抵抗；一度与希特勒结盟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下迅速由被动变为主动，并奠定了战后的大国地位。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民主国家那样顺应形势，调整政策；又不能像专制政权那样无条件地服从一位铁腕人物的统率；却是依靠张、杨“兵谏”这样的偶然事件才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战时也始终没有形成内部的统一。这历史的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当年的侵略和战后的复兴都是由于有列强的支持和有利的国际条件，如侵占东北得逞是因为国联的偏袒和姑息，或是要诱使日本进攻苏联；战后的经济起飞是利用了朝鲜、越南两次战争的机会和石油危机；而中国却没有这些条件。姑且不论事实如何，即使真是如此，中国为什么不在国际冲突中主动寻求有利条件呢？中国的抗美援朝或许还能用“唇亡齿寒”的传统理论来解释，越南战争也值得卷入得那么深吗？自己的国民在勒紧裤带以至饿死的时候，却在慷慨大度地支援“世界革命”；发达国家认为不值得投资的工程，却不惜代价地援助；显然并非出于外部压力。事实上，100年

来，中国并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却一次次丧失了；而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和灾难，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招来了。

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压力似乎是中国落后的必然原因，因为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拥有量，中国都是穷国。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却是地地道道的富国，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是这样，战后以至今天也同样如此。日本的主要工业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铁、铜、铅、锌、锡、镍、铝等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当年日本曾经“以战养战”，通过掠夺被占领国家的资源来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战后又成功地利用外国的资源，建立起了以加工和出口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不仅克服了先天不足，而且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富国家之列。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1990年有1.235亿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27人，是同年中国的2.75倍，世界平均数的8.38倍。无论是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都远低于中国和世界平均数。当年日本的农田面积只占国土的14.1%，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世界平均数的五分之一。但日本却保持着66.5%的森林覆盖率，是中国的5倍，世界平均数的2倍，最近还创造了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两项世界纪录。尽管100年来的具体数据不同，但日本

（下转第135页）

国际刑警在中国

毛磊

进入1995年，“国际刑警”这个字眼不断在中国新闻媒介中出现，日本关西大地震后的第二天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立即开通了警方热线，为中国公民查询灾区亲人下落提供帮助。

1995年10月，世界各国刑事警察首脑聚集在北京，隆重举行国际刑警组织第64届大会，针对日益严重的非法贩毒、文物走私、伪造货币、国际诈骗、恐怖活动等多种跨国性犯罪，讨论其动态和趋势，交流打击经验，研究各种对策，制定行动方针。

毫无疑问，中国警察已在国际警坛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向全球国际性犯罪宣战

《人民日报》1984年9月7日刊发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接纳我为成员”的新闻。

从此，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人们总有一种误解，似乎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国际警察机构。“那些以为我们是用拳头工作的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警官不到世界各地去侦查杀人、偷

盗、贩毒犯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提供情报，协调各国警察当局对犯罪案件进行侦破。我们的王牌是上好的技术设备和迅速为本组织成员国提供优质服务。”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肯德尔这样说。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于1923年，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38年德国纳粹希特勒将其关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刑警组织于1946年在法国巴黎重新恢复活动。1989年总部迁往法国中部重镇里昂，在新建大楼的第一块奠基石上刻着：“愿这座建筑物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服务。”

这个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向176个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犯罪的情况。1995年启用了新设备，一个庞大的电子邮件通讯系统将把世界各国的警方紧紧地联系起来，使罪犯无处藏身。它的警官每天要回答数以千计的关于不同犯罪情况的咨询，一年中要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处理世界范围内的100万条信息。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电子邮件中，最核心的是至关重要的通告。“红色通告”是请求在另一个国家对

一名在逃犯实施逮捕行动；“蓝色通告”是用来警告有关国家的警方，一名职业罪犯正在他们的领土里活动；“黑色通告”表示正在收集有关身份不明的死者情况；“绿色通告”是通报某种犯罪行为，以引起各国警方的警惕，并加以预防；“黄色通告”用于协查失踪者。国际刑警组织已向全球的国际性犯罪行为宣战，特别是每当涉及对付国际性的恐怖主义活动时，它总是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在其卓有成效的帮助配合下，一些罪犯纷纷落网。

朱恩涛其人其事

朱恩涛谈吐从容，举止沉稳，高高的个子，一副秀郎镜戴在他那瘦削的脸上。从气质和修养上看，与其说是个警察，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位学者或外交家。

朱恩涛，中国警察，一级警监，国际刑警组织的知名人物，也是目前这个组织在中国的最高长官。今年57岁的他现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局长，他还是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第64届年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3年，刚刚主持中国警方对外联络工作的朱恩涛，在陪同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现任公安部长）出访欧洲时，受命拜会了当时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博萨。一年后，博萨来北京访问，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代表我国正式提出了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申

请。此后，朱恩涛便着手筹备中国加入这一组织的有关工作。1984年9月，中国被接纳为国际刑警组织的第136个成员国，朱恩涛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刘文一道首次坐在中国的席位上。

朱恩涛是河北保定人，32年前，他本来是抱定宗旨要研究莎士比亚的，1963年他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此后在中国警界供职至今。

朱恩涛曾在广州公安机关工作过10年，他说：“我当时是从事经济犯罪案件的调研工作。”此后他又先后在公安部的5个业务局任过职。

1985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54届国际刑警组织年会上，朱恩涛被选为这个组织执委会13名委员之一。当时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博萨曾对执委会领导成员说：“一个国家在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仅一年后，其代表便当选为执委，这在国际刑警的历史上没有先例。”

对于朱恩涛来说，那似乎仅仅是开始，两年后的56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的三位副主席之一，分工主要负责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国际刑警事务。于是他成了名人。在香港、新加坡、泰国，机场的保安人员能迅速认出他是国际刑警的重要首脑。

有着170多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每天都要面对世界上许多重大的刑事犯罪，这便要求它的领

领导人要决策果断，办事沉稳，更重要的是行动谨慎。“我主持过多次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必须让各方充分发言，从而引起辩论，最终还要解决问题。”朱恩涛这样说。

1990年，朱恩涛的副主席任满后，他又被选为执委会三位顾问之一，负责国际刑警的教育培训。

朱恩涛具有文艺天赋，“我喜欢唱歌跳舞，古典的、民族的、通俗的，还有摇滚音乐，我都喜欢。”闲暇之时他乐于与家人一同去唱卡拉OK，有人说他是美声唱法，但他的小女儿坚持认为父亲顶多是民族唱法而已。

终生以警察为职业的朱恩涛说，国际刑警也是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情趣。

警界外交显神威

中国自从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后，便跨入了各成员国共同打击犯罪的协作和合作之中。正是通过警界外交，才编织成一张国际执法的恢恢天网，令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据统计，10年来中国国家中心局共下发各种国际刑警通缉通报近万件，处理来文来电3万多件，办理案件线索5000多件，办理各类刑事案件5000多件，其中协查重大刑事案件700多起。这期间，中国国家中心局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世界各地发出30多份红色通缉令，多次派出中国警官小组赴国外对特大

涉外案件调查取证，并将数十名潜逃出境的重大刑事罪犯押解回国。

——某公司总经理利用职权侵吞国有资产6000多万人民币，携巨款外逃。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立即向总秘书处办理了“红色通缉令”，并向案犯可能落脚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协查请求和情况通报。1993年8月，境外警方传来发现案犯的报告。中国警官立刻整装出发，他们在境外同行的配合下，巧妙地将逃犯抓获。这一年，中国警方成功地从境外将10多名案犯引渡，递解归案，得到港澳地区、匈牙利、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警方的支持。

——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收到欧洲一个国家中心局发来的通报，说该国一渔业公司经理声称已集资2.5亿美元，正联系在中国兴建水生动物养殖场。而此人与一个国际诈骗集团有联系，该国警方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希望中国予以协助。中国警方立即开展工作，避免国家遭受损失。

——1986年，一名外国不法分子以旅游名义进入我国，在江苏的苏州盗窃了一名德国游客的巨额支票。中国警方在国际刑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中心局的配合下，及时掌握了有关情报，抓获案犯，将被盗支票交还给原主。

——国际刑警泰国国家中心局向中国警方发来特急电报：泰国一艘名为“乔伊斯”的货船，装载价值约300万美元的橡胶去向不明。据

悉该船现停靠在中国上海码头，请求中方采取紧急措施，扣留该船及全体船员。这种海事诈骗，国际上屡见不鲜，令许多国家的警方头疼，中国国家中心局立即进行协调，上海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海上一条名为“伟泰”的货船即为“乔伊斯”轮。中国警察又顶着八九级大风，冒着生命危险将该轮拖进上海港。至此，一宗数额巨大，涉及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国际海事诈骗案终于告破。

——1989年12月，刑事犯罪分子张振海劫机逃往日本，要求政治避难，企图逃脱法律制裁。中国警方及时向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了其犯罪事实，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告，经与日本警方协商，将张振海递解回国。

——轰动一时的“衡水农行”案令中国警方感到十分棘手，诈骗分子从河北衡水农业银行骗走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一旦阴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国家中心局再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冻结了已流到国外的全部信用证，抓获了案犯，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经济损失。

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成立后办理的第一件事与犯罪无关。挪威一女公民来中国旅行时父亲病危，国际刑警挪威国家中心局局长打电话给朱恩涛，请求尽快通知她。当时只知道那位女公民的姓名，别的一无所知。朱恩涛沉着、冷静，通过旅游、民航、边防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查找，终于在10小时之内，从偏

远的西藏找到了她，同时为她准备好了返程飞机票，使得这位女士在其父弥留之际见了一面。事后，挪威国家中心局局长致电，对中国警方的办事效率和负责精神表示赞赏。

还有一次，朱恩涛已下班回家，忽然接到国际刑警香港支局发来的急电：香港一男性公民因家庭纠纷带着4岁的女儿到了广州，声称要自杀，自杀前先要杀死女儿。香港支局负责人请求内地警方对这名男子给予保护。朱恩涛立即通电广州警方迅速查找，当晚8时警察在一家酒店前找到了他们父女。第二天，广州警察在罗湖桥头将两人安全交给了港方。

国际追捕中国逃犯

1990年5月1日凌晨，一架中国民航飞机由法国巴黎飞至北京，机上走下来几名特殊身份的旅客，中国逃犯桑继辉在哥伦比亚国家安全局高级警官维克多·麦罗的押解下，踏上中国国土，等待他的将是严正的审判。

9个月前的一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名年轻的中国人手提一只高级皮箱匆匆走出了中国民航驻沙迦办事处，此人便是26岁的桑继辉。四川省交通厅正在南也门承包一项公路工程，他是借用的翻译，这次是与公司的另外两名工程师到阿联酋联系业务，分工由他保管10万美元现金。然而，利欲熏心的他经过一番犹豫，还是迈出了走向罪

恶深渊的一步。

桑继辉如无头苍蝇，在几个国家之间逗留，一边谋划出路，一边与当地卖笑女郎出入游乐场所，像阔佬一般吃喝玩乐。1989年12月11日，他到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住进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干活没几天嫌太累，吃喝嫖赌出入色情场所倒是挥金如土。

桑继辉携巨款潜逃后，同去的两名工程师立即向中国驻南也门大使馆报告，经过与阿联酋警方交涉，阿警方组织了搜捕。随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也给阿联酋中心局发去协查通报，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章程，成员国之间有相互协查刑事犯罪分子的义务。

应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的请求，1989年11月10日，一道印有鲜红标志的追捕桑继辉的通缉令，从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总部飞往150多个成员国的警察机构。红色通缉令牵动着不同国籍、肤色、语言的各国刑事警察，缉捕的法网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张开。

1990年3月16日，哥伦比亚国家安全局国际刑警处向我方报告，发现国际刑警总部通缉的桑继辉！这是他们在办理桑要求延长签证手续时发现的。中国公安部、外交部请求哥伦比亚警方立即对桑犯采取措施，防止其逃脱，并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派员押送中国，所需经费由中方承担。

哥伦比亚警方同意这一要求，

依法将桑扣押。桑继辉不甘就此被擒，向哥警方诡称：中国警方要抓他是“政治原因”，他未私携巨款外逃。哥警方不予理睬，按照原商定计划派员押送桑犯回中国。在飞机上，麦罗警官用手铐将桑犯和自己铐在一起，这时，桑继辉哭了。

禁毒不分国界

20世纪的最后10年，国际毒潮风起云涌，毒品浪潮成为全球性灾难。有组织的毒品犯罪正伺机入侵各国的经济、政治领域，其手段更加高明狡诈。据联合国统计，每年约有5000亿至8000亿美元来自毒品交易，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施加影响。

中国西南边境之外的“金三角”是当今世界第一产毒区，其鸦片产量已由80年代的年产700吨猛增到现在的年产2000吨以上。中国成为贩毒的重要过境国家。

在曾经一度杜绝吸毒的中国，近年因毒品过境的侵蚀，吸毒之风死灰复燃。到1993年5月全国已发现了775人因注射毒品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近年来，中国警方缉毒禁毒不遗余力，而国际刑警组织也给予了有效的合作。

——1986年8月中国云南警方侦破了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毒品走私案。泰国贩毒分子温源和、香港毒贩戴文煊和余锡宽在昆明偷运海洛因22678克，他们来自著名的毒品产地“金三角”，企图借道我国运往

世界各地。我警方在国际刑警组织和泰国、美国警方的密切配合下,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将案犯一网打尽,并缴获了全部毒品。

——《人民日报》1988年3月18日刊登消息,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刘文宣布,中国公安机关在美国和香港地区警方的合作下,仅用89个小时就破获了一起利用空运锦鲤鱼夹带毒品的国际贩毒案。事情是这样的,中国警方得到情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人用锦鲤鱼贩毒。毒品由泰国启运,经香港、中国内地,最终贩入美国。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网,迅速与香港警方取得联系,核对了情况,同时又及时将案情通报给美国警方。锦鲤鱼是一种名贵的观赏鱼,贩毒分子剖开鱼的肚腹,将装有海洛因的乳胶套放入鱼腹,然后把死鱼、活鱼一起装进鱼缸。中国警察暗中跟踪毒贩到了美国旧金山,就在案犯交接毒品的时候,人赃俱获,十几个案犯被一网打尽,中美警察配合默契。

在国际刑警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朱恩涛受中国代表团的委托,提议在亚太地区建立联络工作组,强化和协调缉毒的统一行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执委会就此作出了决定:由中国、印度、泰国、日本、澳大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组成六国工作委员会,具体磋商这一议题。

朱恩涛还在会议中提出过一项

对毒品进行“综合治理”的意见,受到各国普遍重视。“综合治理”就是要求各国在毒品的种植、制造加工、贩运、吸食等各个环节都要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不仅要治表,还要治本,这样才能根除毒品的泛滥。

他还在发言中提出,国际刑警组织应与联合国有关组织密切合作,帮助、促使种植大麻和鸦片的地方改种其它农作物,以保证原来种植毒品的农民正常生活;还应协助一些国家对毒品的制造加工点进行严厉打击;在毒品的贩运方面,国际刑警组织应与各国警方加强合作,互通情报,把毒品消灭在进入市场之前;他同时呼吁各国卫生机构帮助吸毒者戒毒。与会者对中国代表的发言表示高度赞赏。

(摘自《开放月刊》1995.9.)

文化场中十八怪

① 儿歌尽被情歌代。② 影片叫好不叫卖。③ 一部电影放几载。④ 戏曲只有老人爱。⑤ 点歌骚扰成公害。⑥ 歌星演出放音带。⑦ 大腕一副港台派。⑧ 义演不义把人宰。⑨ 诗歌只有诗人买。⑩ 作家纷纷忙下海。⑪ 杂志争相傍大款。⑫ 报纸广告快过半。⑬ 文摘找钱不付款。⑭ 十五的月亮16块。⑮ 一稿多投满天甩。⑯ 有钱可买“主编”来。⑰ 美女走红摄影界。⑱ 艺术家变大牛仔。

(摘自《中国检察报》)

历史的回声：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中央电视台6月29日的“新闻联播”及第二天的“焦点访谈”都播出了同一条新闻：

1995年6月28日，一位名叫耿淳的中国老人和其他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11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鹿岛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并要求法庭能以公正的态度解决鹿岛公司与中国劳工之间的民间赔偿等问题。

这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立即引起世人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50年之际更具有特殊意义。有识之士指出：民间索赔不是简单的索讨欠款，而是一种权利的体现。从另一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回声。如果我们放弃索赔权利，也就是放弃历史的记忆本身。其实，正如“焦点访谈”主持人所说的，赔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81岁的中国老人耿淳以其耄耋之年走上日本法庭，也正是为了督促日本认识其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浩劫与灾难，因为只有正确看待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将来。

(一)

1944年4月，日本侵略者向我中原地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洛阳一战中，因阵地失手，部分士兵被俘虏，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耿淳的年轻军人。

1944年7月28日，日军将耿淳及其他掳来的战俘和从乡村捉到的青壮农民等299人集中押送到青岛海岸，当天晚上便送上“信庆丸”号轮船东渡日本。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漂泊，8月5日在日本本州下关上岸，8月8日耿淳一行被带到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花冈町（现改为大馆市），为当时的株式会社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从事河道改造工程。闷热的天气、粗劣的伙食、非人的折磨，在十天的旅途中就有6人丧生。此后又有两批中国劳工送到花冈从事苦役，加上耿淳他们一共有986名中国劳工在此为鹿岛公司卖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近300名劳工被活活折磨致死。1945年6月30日，再也不堪忍受残酷压榨和迫害的700多名中国劳工在大队长耿淳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举行了暴动。